

清史論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编

貳零壹叁年号

13 年號

清史論叢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编

貳零壹叁年号

13 年號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史论丛. 2013 年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清史研究室编.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 - 7 - 5043 - 6776 - 1

I. ①清…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历史—清代—文集
IV. ①K249. 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4489 号

清史论丛 (2013 年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编

责任编辑 刘川民
封面设计 丁琳
责任校对 张莲芳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 crtp. com. cn
电子信箱 crtp8@ sina. 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报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76 (千) 字
印 张 24. 25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43-6776-1
定 价 52.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许大龄师的为人与为学

——纪念许大龄教授诞生 90 周年 何龄修 (1)

清代泥石流灾害刍议 刘景莲 (6)

己庚旱灾及其政治影响 鱼宏亮 (27)

清朝地方社会治安文武分工协防体系考论 王爱英 (40)

清中叶朝廷和基层旗人对满洲典礼的张扬 林存阳 (62)

史实在清代传记中的变异

——佟国纲、华善奏请改隶满洲考辨 杨 珍 (73)

凌昶甲、乙之际事迹考辨 黄 健 (100)

疆臣守土:汉军旗人蔡毓荣的“武功与文治” 刘风云 (117)

李堪京师教馆考 龙 武 (131)

汪端年谱 卢志虹 (148)

试论南书房世家的形成原因 李 娜 许文继 (182)

论焦循与八股文 黄 强 (190)

乾隆时期广西乡试舞弊案简述 陈维新 (206)

乾隆时期连台本大戏演剧的宫廷化特色 梁宪华 (216)

学潮、学科与学制

——光绪二十九年张之洞在京参与学务考 陆 胤 (224)

19 世纪中国大众识字率的再估算

..... 徐 毅 [荷] 范礼文 (Bas Van Leeuwen) (240)

郝浴与银冈书院及其历史贡献 刘中平 (248)

韩江雅集

——清中叶士商互动的个案研究 吴伯娅 (253)

所见、所闻、所传闻：《阅微草堂笔记》的采信分析	潘星辉 (275)
乾嘉学派中江藩的归属问题探析	徐道彬 (289)
《周益文忠公集》对清代辑佚学的贡献	
——以朱彝尊《经义考》与四库馆臣《永乐大典》辑佚为例	谷 敏 (299)
“以书经世”与“藏而为学”：管庭芬藏书思想刍议	李立民 (309)
13—17 世纪西方对中国人娱乐之认知	
..... [美] 康士林 (Nicholas Koss) 著 李华川译	(319)
远方奇人与蛮夷之祸	
——明清之际士人社会对天主教的总体认识	吴莉苇 (330)
《李安德日记》节译	李安德 著 李华川译 (352)

许大龄师的为人与为学

——纪念许大龄教授诞生 90 周年

何龄修

记得 2000 年 12 月 23 日，母校北京大学历史系，举行许大龄教授《明清史论集》出版纪念暨学术座谈会。选择的时间寓有纪念许先生诞生 78 周年的意义。出席的有王钟翰、韩大成、王思治、马克尧、周良霄、郝斌、王天有、朱诚如等诸位先生。我曾在会上发言，阐述许师的为人与为学，后将其复原成文。今值先生九秩冥诞，重读此文，觉尚能稍存实际，故略加删补，公开发表，以当招魂一哭！

许师诞生于 1922 年 12 月 18 日，四川屏山人。1953 年秋，我入学的时候，他才 31 岁。他教中国古代史，但不教上古，只教近古，名为《中国史》（四），即元明清史。这三朝历史比较难学难教，三朝中有两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自身传留的史料寥寥可数，史料缺乏必然带来治史的巨大困难，因此新中国建立前治元、清史者很少，有杰出成就的专家、学者尤其乏人。许师虽然初出茅庐，但已有可观的学术成果，一本《清代的捐纳制度》出来，就使学术界多少有些震惊，时人对之不得不另眼相看。因此，虽然我们入学一年半他还没有给我们上过课，班上与他相识向他求教者已不乏其人。他的体质单薄，但弱而不馁，英姿焕发。衣装简单，夏穿白衬衣、西裤，冬穿棉长袍（只维持一二年，长袍即不再流行，冬装改长短大衣），朴素中伴有几分风流、潇洒。1955 年上半年，他来我班上《中国史》（四）了，师生关系更加密切起来。许师待人亲切、自然，不做作，思想上既有中年的稳重、深刻，又有青年的敏锐、勇敢，还有幼年的天真、幼稚，容易接近。“文革”十年动乱，对他影响很大，在与他共过事的人中，或认为他很“左”，有时会下说的比会上说的更“左”，表示“不好懂”，难以理解。而我以为，不管他说什么，他都是真诚的，他说的就是他想的。他的过左思想，是他在“四人帮”的压迫下，政治上的不成熟、天真起了不应有的重要作用的结果，是比较容易改正的。

我记不大清楚了，大约是在读三年级时，系里还将我们加以分配，准备学习不同领域的史学专门科学。我被分在中国古代史专门化明清史组，导师是袁良义先生，同组同学张仁忠、饶良伦、薛宗正。我们与作为明清史专家的商鸿逵、许大龄两先生也很亲近，接触频繁。我因留京，与三位老师的联系更容易维持。现在我把在同许师的长期接触中得到的对他的认识，归纳为三点。

一是许师的为人。

许师有极鲜明的个性。他为人平和，厚德载物，大度待人。但并非不讲原则，不辨是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过疾言厉色，面红耳赤，挥拳裹袖，拍桌摔碗的盛怒失态。我所见到的许师，总是一脸温馨的微笑，好像世上没有任何事让他烦恼到要动怒。他写的《读〈校对一条史料〉》，最能反映他为人平和的特点。他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曾引用一条有关苏州纺织工的史料，正确指出它反映的时代，注明它的多种出处。后来有文章批评许先生等没有查对最早记录该条史料的原始记载，时限判断有误。许师著文反驳。我读过郭老、翦老一些学术批评文章，深感其文风刚烈，火光四射，一种百分之一百二十真理在手的气势。特别是初读翦老关于《资治通鉴》编写分工问题批评阎简弼先生的文章，因翦、阎两先生都是我的老师，读来心惊肉跳，感受难以名状。许师《读〈校对一条史料〉》，虽然不平之气满纸，但是非分明，使用和风细雨、行云流水的文字。他在《忆柴师》一文中说，发表前请柴德赓先生看过，指点他“别发火气，别骂人”。他深受教育，完全遵命。《读〈对一条史料〉》，真正文如其人。

热情、重感情，是他为人的又一个特点。这首先表现在他培养学生，倾囊相授，我每次见到他，都是听他谈读书和研究。他给我们讲中国史（四）时，我对地方志还不大熟悉。有一次他给我讲述地方志中史料的丰富，举了很多实例，告诉我，海盐县志中，如胡震亨等的天启《盐县图经》、徐用仪的光绪《海盐县志》，都修得较好，看一下这些志书，就可以了解地方志的体例和主要内容，渐渐摸索，从中发现问题、觅得材料。又补充说：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山东省地方志较多较全，是它的特色。这些都是先生自己的心得，在当时还是重要的信息和知识。教给学生，少走弯路。

许师对师母张润瑛感情真挚。打倒“四人帮”前，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还在吃早点。我一看，许先生吃的，是城里最标准的穷人早点：馒头、棒子面糊糊、咸菜。我见了就毫不犹豫地说：“许先生，您的营养明显不够，要注意身体健康，吃好一点。”他喊着我的名字，回答说：“我现在遭报应了，过去觉得我的时间很宝贵，要看书，要备课上课，要做研究，从来不做家务，把家务都推给张润瑛，连自己的饭碗都不洗，结果把她累垮了，动弹不得，一切都要我自己做了。我不会做，只好凑合了！”话里充满很深的自责。师母得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卧床不起。我自己曾是长逾二十年的极其严重的全身性多发性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知道劳累会促使炎症发作，但不是原发病因。

这个病的病因病理至今不完全清楚，推测它与感染、遗传有关，也没有证实。许师不分担家务当然不好，师母的病却不是他不做家务的结果。他的自责过头了。师母的病得到一位湖北医生的治疗，以有毒植物水莽草为主药。许先生体质瘦弱，仍亲赴湖北买药，学会熬煎。他给我讲解过熬药方法，药熬好后要加酒冲服。最关键的是掌握药物的分量，不足则疗效不佳，过多则引起中毒。我想象得出一位料理生活能力很差的书生，掌握这种复杂工夫之不易。这里浸透了先生对师母浓浓的感情。

谦虚、诚恳、虔诚，也是许先生为人的突出特点。进到较高年级，我们的专业课增加。1956年，吴晗先生给我们开《明清史研究》课程。许先生已是有名专家、学者，却每讲必听，坚持不懈，并且认真笔记。我很惭愧，做的笔记是粗线条的。许先生笔记很详细，以致《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编者一度考虑将其作为记录稿收进书中。由此可见他虚心学习的态度。他有很重的书生气，在大领导面前甚至紧张得说不出话。同年春，他与我们全班同学游明十三陵，巧遇刘少奇委员长，刘委员长知道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就招呼大家在草地上围坐谈话，问起教明清史的许先生对朱元璋的看法，许先生很慌张，脑子里一片空白，好一阵才挤出一句“他杀人太多”。他在这种意外的场合，不是一个擅长辞令、巧作应答的人，他的窘迫和笨拙，正反映出他的纯朴和实在。我还觉得他有周一良先生说的那种“原罪”思想（参看周先生《毕竟是书生》），自认为是天生要改造的坯子，因此努力适应新政治思想的需要。我曾听说他下乡拔麦子，跪在地上拔。他完全缺乏拔麦子的体质和技能，但仍勉为其难去做。我听了真是难过。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心中一片赤诚。

我们有时对许先生某些说法、做法并不完全认同。他完全可能突然冒出一句我称之为“另类思想”产生出的话来。有一次，我对他说：“许先生，我觉得不管多大的权威都有闪失，不可迷信，科学和迷信真是互不相容。我上了陈寅恪先生一次当：我本不怀疑《明史》范景文传所记崇祯七年冬范景文起用，未几就拜兵部尚书，但陈先生依据别的材料，在《柳如是别传》中宣称《明史》此项时间记载有误，自行作了修改。我盲目相信了陈先生的修改，在我已经定稿的《柳敬亭（传）》中加注修改（收入《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4卷）。后来我读范景文的集子，才知道是陈先生改错了。我跟着错。搞科研就不该偷懒、迷信！”说到这里，许师马上一面喊着我的名字，一面用肯定的语气说：“你是有根据的！”这六个字传进我的耳朵，不禁大吃一惊，目瞪口呆，不知所云。我真的弄不懂，他怎么会突然想出这样一句话来？这类说法我自然不能认同，但我敢说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是真诚的，没有多余的考虑，没有假话。

这是我对许大龄先生为人的最强烈的印象。

二是许师的“门户”。

“门户”一词是先生自己的用语。1988年中山大学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闭幕

不久，一天，我去他家探望、闲聊。我问道：“纪念陈寅恪先生的会，您为什么没有去参加？”许师毫不犹豫，斩钉截铁答道：“门户不同。”我接着问：“您属于什么门户？”他答复说：“陈援老嘛。我在辅仁跟援老学，毕业后援老想留我当助教。我听说燕大邓文如（之诚）先生治史，重视发挥制度的作用。觉得不错，就考上文如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又得知翦先生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站得高，看得远，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我又心向往之，于是私淑翦先生。所以有陈援老他们的纪念会，就会请我，我就得去。”我听了，明白许师虽用门户二字，实际上没有门户。他实行一种不断追求进步、追求更新、追求突破，不断扩大知识面、攀登新的学术高峰的路线，学习、继承、发扬三位史学大师的学术。

考研究生，投师问业，是很棘手的事情。并非学习上东抓西捞，投师上朝秦暮楚，就是正确的学习路线。如果那样认为，就大错特错了。最为关键的问题有两个：投谁和学习什么？一个自己稀里糊涂的人，你叫他去谈任何问题，他能说清楚吗？肯定是说不清楚的。素质差的老师，是带不出优质学生来的。必须投到学问好、品行好的人的门下，才有可能成为人才。青年学子解决好了这些问题，就为在好导师指导下学习好的专业准备了条件。如果拥有此种选择的眼光，到时候用出来，就很有可能找到好的导师和专业，走上富有成果的学习道路。而这需要很高的鉴赏力、识别力，干脆说也就是要具备较丰富的知识和较高的学术水平。许师读大学时可能就培养了这些能力，又没有门户之见，不墨守，思进取，就能顺利发展。

这就是许大龄师的学术渊源。

陈援老治史有成体系的方法，尤擅长考证，为求论据充分、准确，特别重视学术创新，坚持寻觅新史源，开辟新史学领域。许先生的史学在总体上受陈援老的重大影响。他的论文从不讲空话，资料丰富，史论结合，严谨可靠。他的《清代捐纳制度》是学习邓文如先生的第一部作品，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以后他又研究和撰写《明朝的官制》，继承、发扬邓先生重视制度的学术传统。他研究社会经济史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农民战争史，是学习翦先生的结果。因此，三位史学大师的学术传统，在许先生的史学中都有完美的体现。

三是许先生的学术成就。

在分析这个问题前，我想先说明，我认为许先生的学识连四分之一都没有发挥出来。我们知道，他研究生毕业时不满25岁，已经写出《清代捐纳制度》，用这样的科学创造力与他此后将近50年的著作表现相比，就可证明我的看法符合实际。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二：（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约30年中，劳动和运动过多，不能不占去科学研究时间；而许大龄师的这个年龄段，是因此受到不利影响最大的年龄段。年纪比他大一辈的人，在学术上已有较多表现；比他小一辈的人，有较多的补救时

间。令人觉得最明显的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刚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就不得不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体力劳动和政治运动上。这对他的影响十分严重。（2）他的体质过弱，健康太差。打倒“四人帮”后，他年方壮盛，本可抓紧时间做些补救，但一家三口全是病人，师母需要有人寻医煮药、照顾生活，他自己遭受生活和思想两重负担，过早缠身的老年病的折磨，进一步损害了健康。他因此丧失了转瞬即逝的做补救的时间，还失去了必需的精力。1991年前后，他快70岁时，有一次我问他在研究什么，他叹口气说：“唉，我还能做什么研究？我驾驭不了一个题目啦！我只能写写推荐书、鉴定意见了。”我听了默然无语，深深悲哀。他的健康状况让学术生涯雪上加霜，提前结束了。

尽管如此，他仍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

《清代捐纳制度》是他的成名作。从著成这么多年后回头再看，此书未必尽善尽美。限于条件，他未能利用档案史料，是明显的不足。对一些特殊时期（例如大规模用兵时期）捐纳制度的变通，也缺乏专门探索。但此书全面研究了清代捐纳制度的沿革、组织和影响，至今没有人再挑战这一课题，没有第二本同课题著作问世，海峡两岸都重印此书供学习、参考，充分说明《清代捐纳制度》的科学生命力。

他在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承担写作元明清史部分。这是迄今我见到的最简明、切要的元明清史。这部分元明清史，完全证明了他对这三朝历史的深刻掌握，表现了他著作这些断代史的学力。

他在《北京史》一书中所撰著的《明代北京的经济生活》等，深入探讨了明朝政治对北京经济的影响，论述了北京经济生活的全貌，具有开创性。他在通史和专著中完成的一些章节，应是他的一部分代表作。

总之，许大龄师虽因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史学事业中未尽所长，充分发挥，但数十年辛勤劳动，毕竟为社会留下了价值不菲的史学遗产，并奠定了他本人在新中国史学界的地位，成为公认的著名元明清史家。他的为人与为学，是一笔重大的精神财富，将在长时间里供后人学习、研究、继承、借鉴，不会被人忘记。

清代泥石流灾害刍议

刘景莲

近年来泥石流灾害越来越突出与频繁，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损失。2010年8月7日22时许，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突降强降雨，县城北面的罗家峪、三眼峪泥石流下泄，由北向南冲向县城，沿河房屋被冲毁。泥石流阻断白龙江，形成堰塞湖。这次泥石流灾害致使1270人遇难、474人失踪，是解放后我国发生的最大一次泥石流灾害。^①

今年我国的泥石流灾害不断。2012年6月28日早晨6时许，伴随着山摇地动的巨大轰鸣，四川省宁南县白鹤滩镇矮子沟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浪头足有5层楼高。四川是我国泥石流高发区之一，政府对这里的泥石流灾害非常重视，在泥石流研究和预警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泥石流发生十多个小时前，有关方面已经发出泥石流预警，矮子沟沿岸村民全部撤离，无一人死亡。然而，住在沟内的三峡公司白鹤滩水电站前期工程施工人员及家属却因通知过程中存在疏忽，未能幸免，40人遇难。7月21日下午北京发生了61年来的特大暴雨，城区内多处低洼地带形成积水，在房山区的山区峡谷内形成区域性泥石流，^② 官方报道，北京地区有两人死于泥石流，^③ 而与北京交界的河北涿源，亦有泥石流爆发，死亡人数不详。8月12日晚，曾遭“5·12汶川特大地震”重创的重灾区四川德阳市下辖的绵竹市清平、天池等山区发生强降雨，引发多处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7人死亡、7人失踪。整个清平乡遭泥石流淹没长约3公里，泥石流达600万立方米。北京地区也发生了泥石流，这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① 马力：《地质气象灾害》，气象出版社，2009年，第120-127页。书中认为，解放后国内共发生5次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其中造成人员死亡最多的一次是1981年7月27—28日发生在辽宁老帽山的泥石流灾害，死亡664人。

② 7月26日，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新闻发言人向媒体正式公布了“7·21”特大暴雨山洪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名单，共有77名遇难者，其中死于泥石流灾害的至少2人，因为事件发生在京城及其近郊，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③ 王礼先、王志民：《山洪及泥石流灾害预报》，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年。此书论述了北京山区的荒漠与山洪泥石流灾害，泥石流灾害统计数据从1950年起。在第35页，作者认为1950-1991年间，北京山区的荒漠灾害共造成515人死亡，7361间房屋被毁。除1950年门头沟清水发生泥石流灾害外，严重的荒漠灾害几乎全部发生在北部山区，另有日益频繁加重的趋势。

舟曲重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泥石流灾害引起笔者关注,开始探寻清代历史上的泥石流状况。近来日益频发且给人民财产、生命造成重大损失的泥石流灾害,促使此文的草就。本文拟在力所能及对清代泥石流史料爬梳基础上,将自己对此关注的一些粗疏的学习心得呈现给大家,抛砖引玉,不妥之处望指正。

一、中国泥石流研究的状况与清代泥石流研究

泥石流是松散土体在暴雨暴雪作用下,泥石与水的混合物沿自然坡面或压力坡面快速流动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常易发生在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山区。

泥石流具有突发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对于山地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的山地大国——中国而言,地貌条件造成我国成为泥石流高发区的状况。

泥石流研究上国内外均起步较晚。1968 年日本的飞驒川沿国道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此后,日本开始注意泥石流研究,并迅速发展起来。

解放前,我国因山区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泥石流对人类财产和生命造成的损失,相对于地震、旱灾、水灾等造成受害面积广,人员、财产损失严重的灾种而言,因为不是很重要的灾种,学术界对此很少关注。

20 世纪 60 年代,在我国山区经济建设和资源开发利用推动下,泥石流防治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为配合川藏公路、成昆铁路、金沙江航道以及我国西南、西北山区工矿城镇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等重大工程,地质、冶金、城建、水利、农林、矿山等系统相继开展了泥石流灾害调查研究,泥石流研究工作得以发展起来。

泥石流研究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新兴的一门边缘学科,与地质学、地貌学、水文学、气象学、力学(流体力学、泥沙运动力学、工程力学等)、土质土力学、流变学等密切相关,因而自然科学界在此领域投入了相当多的力量。70 年代末,中国科学院把泥石流列为学科发展重点。1973 年在成都地理研究所(现名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内设立泥石流研究室。1978 年,又将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泥石流研究骨干调整集中到该研究室,这里由此形成我国泥石流研究中心。他们以建立泥石流观测站为起点,在云南建立起东川蒋家沟泥石流半自动观测研究试验站,在四川建立起九寨沟泥石流综合研究站,并建立泥石流动力学模拟实验室。他们通过泥石流调查、模拟试验、力学分析及防治工程实践等,在泥石流的形成条件、形成机理、泥石流的物质组成与静力特征、泥石流的流量计算、泥石流危险度分区研究、泥石流防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泥石流研究综合性的研究著述代表有:2000 年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编写、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泥石流》一书;2004 年 10 月科学出版社出版

的康志成、李焯芬、马蔼乃所著《中国泥石流研究》一书。

区域性泥石流研究,随着近十年来我国县、市地质灾害大调查的实施,研究成果丰富起来。有兰州市国土资源局、甘肃省地质环境监测院编写的《兰州市地质灾害与防治》;张信宝对云南大盈江流域泥石流的研究,唐川对云南省滑坡泥石流重点区域的研究,崔鹏、王裕宜等分别对云南蒋家沟泥石流的研究,张金山等对四川汶川县茶园沟泥石流的研究,邓嘉农等利用卫星遥感影像并结合实际调查方法对陕西陕南地区泥石流发育程度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李昭淑等通过野外调查对商洛地区暴雨型泥石流的研究等,诸多区域性研究无法一一赘述。

通读这些研究,观其研究者,无一不是由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进行。他们的研究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论及泥石流的特征、性质和基本规律,从形成机理、发育过程、分布分区、泥石流力学、运动力学、数学模型等角度展开。

比如在泥石流灾害评价中牵涉到的区域易损度、灾害度和减灾优先度研究方面,自然科学界的学者发展了用于单沟和区域泥石流危险度和易损度的评价模型,模型表达为多元线形函数和多元非线性幂函数,由此得出单沟和区域泥石流风险度的计算公式。

比如在泥石流危险程度的判断性研究方面,他们认为:尽管泥石流危险度评价的因子可分为主要因子和次要因子,表达为几个因子或十几个因子的综合模型,但真正代表泥石流危险度本质特征的因子只有两个:泥石流规模和发生频率。泥石流危险度在理论上表达为泥石流规模和发生频率的乘积,这一理论成果,阐明了泥石流危险度今后研究的目标和方向,即要大力加强泥石流规模和发生频率的研究,建立起两者之间明确的定量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地理信息系统(GIS)、卫星遥感等新科技手段被引入泥石流研究中,并将逐步成为研究的发展方向之一。

通读自然科学界学者的研究,他们在研究中关注的对象都是解放后在中国境内发生的泥石流。无论在自然科学界学者的专著还是论文中,我们都没有找寻到中国历史上泥石流状况的论述。就如前面自然科学界学者自己的结论中所提及的,泥石流的危险度是今后的研究方向,而危险度的确定是由泥石流规模和发生频率的乘积决定的。发生频率的研究,就是要尽力全面去了解中国历史上泥石流发生的实际情形,而在这方面的的工作,正是自然科学、史学界学者需要共同努力去开展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这项工作的前车,犹如中国地震灾害研究中我国地震工作研究者与历史学界通力合作所作的努力。“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地震灾害十分重视,在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中,新建工矿企业需考虑所在地的地震危险性,以便在设计上采取一切可能得到的原始记录,以便全面了解我国地震情况。1953年开始,以原中国科学院第三所为主,由其协同其他文史单位,查阅各种文献八千五百余种,八九千次地震资料,经过审核、

校订、注释,编为《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两册,这是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所做的一件对于地震科学有着重要意义的工作。”^①1956年,他们之间的合作收获了历史性的突破成果——《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两册。地震学工作者在此资料年表基础上进行充分的分析和汇编,确定了中国古代地震的量化参数标准,为编制1911年前的中国历史地震目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在此年表基础上,缘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地震局联合发起组织地震工作者和历史工作者对地震史料再做一次广泛的搜集编纂,自1978年始,历时5年,在1982年完成了《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5卷本,1987年出版。^②

无论运用自然科学的模式进行研究,还是应用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中国的泥石流问题,对中国历史上既往泥石流发生状况的认知,都是重要的工作环节。

与自然科学对泥石流研究日渐深入相比,史学界对泥石流的研究就显得较为缺乏。在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学界惯例是将泥石流、山崩、山裂、地裂、地陷统归到地质灾害类中。

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邓拓先生著《中国救荒史》,书中从第21页始为明清灾情总述。作者按照年代顺序,列举了明清大的灾害,在叙述清代灾害数字统计时,邓先生写道,“清朝统治中国,共二百九十六年,灾害总计一千一百二十一次,较明代更加繁密。其中有:旱灾二〇一次;水灾一九二次;地震一六九次;雹灾一三一次;风灾九七次;蝗灾九三次;歉饥九〇次;疫灾七四次;霜雪之灾七四次。”^③内中无地质灾害一项,更无泥石流。也许作者将其夹杂在水灾中,但因无水灾的具体史料罗列给读者,这仅是一个估计。

1990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时间起自1840年,以编年体的形式,以时间先后为序,叙述近代中国的灾荒大事。泥石流的资料混在其中,要逐一去寻,只是所收集的材料时间上最早在1840年,1840年前的就要另寻他径。

1997年出版的高文学《中国自然灾害史》,其清代自然灾害中列有地质灾害一节,下设两目:(一)清代地质灾害概况,(二)清代地质灾害史料(1644—1911)。内容从第329页至第333页,共5页,其中史料占了4页,史料“据《清史稿》及有灾史籍,这里收集到地质灾害及灾变共124条,其中山崩97条,泥石流3条,地裂13条,滑坡(山移)3条,地陷8条,城陷3条”^④。仔细查看其罗列的史料,以山崩为最多,97条,约占全部地质灾害的78%,泥石流只列3条。

① 顾功叙、林婷煌、时振梁:《中国地震目录》(公元前1831—1969),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iii页。

② 谢毓寿、蔡美彪:《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87年。

③ 邓拓:《中国救荒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3页。

④ 高文学:《中国自然灾害史》(总论),地震出版社,1997年,第3333页。

中国泥石流的研究，缺少对历史上泥石流状况的了解，是不完全的，泥石流灾害的研究呼唤史学家的更多参与。

二、泥石流在清史研究中需要关注的几个技术问题

1. 现代与古代——泥石流与清史资料的连接

研究清代泥石流，首先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献资料中原本没有“泥石流”一词。泥石流一词始于20世纪50年代，逐渐在自然科学界出现并使用，是英文mud-rock flow disaster的中译。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这是首先遇到的第一个要清理的技术问题。中国历史文献中现代意义的泥石流是什么？有哪些特征？只有搞清、确定了这个技术界定，才能开始有效且尽量避免错误的资料爬梳工作。

将现代的泥石流从清史资料中有说服力地找出来，衔接两者的途径只有对现代所称谓的泥石流有一完整、正确的认识。

我们知道，有关泥石流的定义，西方有代表性的定义有5个^①。教科书中给出的定义是：泥石流是在山麓环境中常见的，在水流中含大量弥散的黏土和粗细碎屑而形成的黏糊的呈涌浪状前进的一种流体。如果这种流体中含粗碎屑很少，则称泥流，但泥流比泥石流少见。^②通俗而言泥石流，就是容易在山区峡谷中突然发生，含有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碎屑物质，并具有强大冲击力和破坏作用的特殊洪流灾害。

泥石流形成具有三个条件：

其一，陡峭的便于集水、集物的山区沟谷。地形上具备山高陡峻，沟深、沟床纵度大，流程形状便于水流汇集的特点。泥石流发生后，一般会形成泥石流形成区、流通区和堆积区三个部分的痕迹。上游形成区的地形多为三面环山，一面出口的瓢状或漏斗状，比较开阔、周围山高坡陡、山体破碎、植被生长不良的地形有利于水和碎屑物质的集中；中游流通区的地形多为狭窄陡深的峡谷，谷床纵坡降大，使泥石流能迅猛直泻；下游堆积区的地形为开阔平坦的山前平原或河谷阶地，使堆积物有堆积场所。

其二，岩石破碎，崩塌、错落、滑坡等不良地质现象都是充分松散的固体碎屑物来源。岩层结构松散、软弱、易于风化，或软硬相间成层的地区，因易受破坏，这些也成为泥石流提供丰富的碎屑物来源；一些人类工程活动，如滥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开山

^① 王礼先、王志民：《山洪及泥石流灾害预报》，第5页。

^② 何镜宇、孟祥化：《沉积岩和沉积相模式及建造》（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书），地质出版社，1987年，第9页。

采矿、采石弃渣等,往往也为泥石流提供大量的物质来源。

其三,短时间内形成大量而又急促的暴雨。水既是泥石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泥石流的激发条件和搬运介质(动力来源)。泥石流的水源,有暴雨、水雪融水和水库(池)溃决水体等形式。我国泥石流的水源主要是暴雨、长时间的连续降雨等。

自然科学界对泥石流的研究主要有三种分类方法。(1)按其成因:划分为冰川型泥石流、降雨型泥石流、共生型泥石流三类。共生型泥石流涵括滑坡型泥石流、山崩型泥石流、湖岸溃决型泥石流、地震型泥石流和火山型泥石流等成因的泥石流,以及人类不合理的经济、工程活动而引发的泥石流。(2)按泥石流体的物质组成分类,主要为泥石型、泥流型和水石型。泥石型中的成分是大小不等的黏土粉砂、石块。泥流型以细粒泥石流为主要固体成分,主要发育区在黄土高原地。水石型多发生在大理岩、白云岩、石灰岩、砾岩或部分花岗岩山区,是由水、粗砂、大块碎石组成。(3)按泥石流流体性质分类,有黏性泥石流和稀性泥石流两类。

我们在理解性借鉴自然科学界有关泥石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照这些定义、条件和要素,去寻找、研究清朝文献中所记载的清代泥石流,无疑是一条不宜走偏的捷径。

2. 泥石流与山崩、山洪之关系

一次完整的泥石流发生具有流动连贯性,包含头坡坍落、泥石流流泻、造成沉积尾流三个阶段,这个过程的前后阶段循序缺一不可,且不可逆。这三个阶段在泥石流发生后的痕迹遗留上,一般会形成泥石流形成区、流通区和堆积区。泥石流发生的连续三阶段,不可回避地牵涉到与山崩、山洪的关联及区分问题,也是极易产生混乱与混淆的问题。

首先我们谈一下泥石流与山崩的关系。头坡坍落阶段,在史书中通常显示的词是“山崩”。山崩是崩塌的一种物质类型,顾名思义是山体上石块因发生状况而发生崩塌坠落的现象。这个现在仍在使用的词,在清史资料中常见。

山崩产生的原因很多,常见的是淫雨、霪雨、大水、大雨、雷电、风、地震等,尤以霪雨、淫雨、大水、大雨为多。顺治三年(1646)广东河源县“霪雨,桂山崩裂数十丈”。^①顺治六年春,江西永新县,“南乡淫雨,山崩”。^②顺治七年六月初一日,湖南长沙府“夜大雷电,明晨江水暴涨,高山崩。田稼多伤。明年大饥疫”。^③顺治七年九月,贵州绥阳县,“大水,山石崩裂”。^④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十三日,会同县“大水,山崩石裂,坍塌田地百数十亩”。^⑤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初四日,福建闽侯县

① 康熙《河源县志》卷8“灾祥”。

② 同治《永新县志稿》卷3“灾异”。

③ 康熙《长沙府志》卷8“祥异”。

④ 道光《遵义府志》卷21“祥异”。

⑤ 康熙《会同县志》卷1“星野”。

“大雨，黄金钟山顶石压土崩，其声如雷”。^①

暴雨和不停的降雨，都极容易造成山崩。一种灾害的发生往往引发其他地质灾害，山崩之后形成堆积的松散石块，成为泥石流的重要物源。山崩是引发泥石流的诱生条件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山崩都会变成泥石流。如何判断山崩是否会演变为泥石流？山崩之后当暴雨突然来临，使得山崩的石块有可能随着巨大的山水顺地势流下，山崩演变为泥石流灾害的可能性增加。

翻阅资料初步发现，清代发生 100 次泥石流。这些泥石流的发生过程中，发现大雨、暴雨、山崩通常是泥石流形成过程中的条件。雨、水在每次泥石流发生过程中都是必要出现的词，只是有时会以不同的词出现。

时 间	雨水状况	是否发生山崩
顺治五年（1648）六月	蛟	山崩
顺治八年（1651）	大水	山崩
康熙七年（1668）五月	大水	山崩
康熙十四年（1675）八月	大雨	山崩
康熙二十年、二十二年（1681）、（1683）	龙	山崩
康熙二十一年（1682）四月	大水	山崩
康熙二十九年（1690）八月	霪雨	山裂
康熙四十一年（1702）五月	霪雨	山崩
康熙五十三年（1714）	大雨水	山崩
康熙五十七年（1718）	大雨	山崩
康熙六十年（1722）春		山崩
康熙六十年（1722）春	蛟	山崩
雍正三年（1724）		山崩
雍正八年（1732）	骤雨	木石多崩
乾隆四十九年（1784）	大雨	山崩

在清朝发生的 100 次泥石流灾害中，泥石流发生之前出现山崩的现象有 13 次，骤雨引发的木石多崩一次，霪雨引起的山裂一次。

泥石流发生前的 13 次山崩，11 次都是与雨、水相伴。大雨引发山崩的 4 次，大水

^① 乾隆《福建通志》卷 65 “祥异”。